



## 追憶在中央圖書館

王 省 吾

我於1945年5月入中央圖書館，至1949年8月離開，在館共四年三個月。在此短短期間內，日本投降，抗戰勝利，接著中國共產黨反對國民政府，發生內戰。我隨著中央圖書館，自重慶回到南京，再遷至臺灣。關於中央圖書館的組織與發展經過、藏書內容，兩度播遷，所運圖書箱數與種冊，均已詳細報導，我現在只就我個人在中央圖書館體驗所得，追記如下：

我在貴州遵義浙江大學學歷史。在校時，因家庭接濟斷絕，曾在大學圖書館做短工，賺點零用錢。1944年6月畢業後，覺得在圖書館工作，能就便借用圖書，做歷史研究。當時適重慶中央設計局新增圖書館，需要工作人員，國立中央圖書館蔣復璁館長兼任該館主任，我因浙大史地系主任張其昀老師的介紹，於當年7月進該館任幹事，負責秘書工作。第二年，蔣氏辭職，便將我調到中央圖書館，名義仍是幹事，派在編目組工作，除編製中文書目錄卡片外，並補充蔣館長所主編的「中央圖書館分類法草稿」，此稿於抗戰勝利後，曾帶至南京，後又帶到臺灣，仍由我負責修訂。到臺灣後因蔣館長與我，均忙於圖書館行政事務，無暇及此。去年5月27日，我到南京圖書館訪問，據該館辦公室副主任包中協先生告訴我，南京圖書館已採用這個分類法，作為他們編製目錄的標準。

中央圖書館館舍在重慶兩浮支路，於1941年1月落成開放。當時重慶在日本飛機轟炸之下，大多數用竹子所建克難房子，中央圖書館新廈為少數水泥鋼骨洋樓之一。新樓為丁字形，前面一排三層，二、三層為閱覽室，底層為辦公室，後面為五層高樓，作為書庫。正面對著長江，四周築有圍牆，園內花木扶疏，風景優美。閱覽室寬大舒適，遠較在臺北植物園時的狹窄情形為優。在附近有美國大使館新聞處。因有這兩個文化機構，兩浮支路成為文化界、新聞界聚集

的地方。我初到中央圖書館，一方面急著找書讀，另一方面想學英語，可惜中央圖書館的閱覽室，因限於電源供應，晚上光線暗淡；相反的，美國新聞處圖書館室內電燈明亮，在大門口，且裝有收音機，整天廣播。每天晚上，我的大部分時間，都花在那裡。當時，我沒有錢，也買不到收音機，美國新聞處是唯一可以收聽英語的地方。我雖在中學大學學過英語，但聽力甚差，且未能開口；但我很快發現，先看英文報紙，再聽新聞廣播，便能聽懂所報告的內容，所以有美國新聞處這一架收音機，對我來說甚感滿足。

中央圖書館不僅燈光不足，員工上飯廳用飯，也無凳子可坐，大家站著吃，且小菜惡劣，難以下嚥。同事們經常彼此合作，購買肥肉熬油助餐。記得我初到圖書館，蔣館長特別吩咐總務組查先生為我買一張竹床。員工寢室設在藏書庫頂樓，那裡約可放一二十張床。除我與儲連甲兄自中央設計局轉來外，其他同事的名字，已記不清楚。戰時重慶，除電影院與一些活動中心有話劇演出外，無可去的地方。有一天晚上，我與一同事出去看電影，回來大門已上鎖，我們翻牆而入，為巡夜警衛發現，幸蔣館長並沒有處罰我們。此等清苦生活，在那時的重慶是普遍現象，但大家都瞭解，為抵抗日本侵略，政府財政有困難，我沒有聽到過有人在抱怨。

1945年8月10日晚上，我在美國新聞處聽廣播，收音機突然播出「日本投降，抗戰勝利」。這個消息不單是我，所有與我共同收聽的，一時都發呆了；但馬上想到，有了回鄉的希望。整個重慶城，變成瘋狂世界，到處人潮，唱歌的、跳舞的，我也跟著人到處跑。等回到圖書館寢室後，不免有點迷惘，圖書館是否搬回南京？能否與我的女朋友，即現在的妻子樓占梅同行？

大概是年年底，蔣館長宣布，重慶中央圖書館改為羅斯福圖書館，現有一部分員工將遣往南京，接收

舊館。第一批派出員工有八人，我們稱為八仙過海，因須經過有風險的長江三峽之故。這八個人，就我現在能記憶的，包括屈萬里、蘇瑩輝、儲連甲及我。我們乘民生公司輪船東下，一路欣賞長江沿岸各地風景與古蹟，尤其三峽的急流深谷，險石與暗礁，使我們驚為奇觀。出三峽後，平疇千里，我們很高興看到歷史名城，宜昌與江陵（荊州）及雲夢湖區。在漢口發現即將遣返的日本人在擺地攤，在九江遊瓷器街，在蕪湖吃醉蟹。

我們的船於1946年2月抵南京，有人來接我們去成賢街66號中央圖書館原址。在那裡有三棟西式樓房，進門靠右為館長辦公室與總務組，靠左樓上為編目組，樓下為採訪組，再向前為一座比較大的二層洋樓，闢為閱覽室。我們到南京頭一、二個月的主要工作為清點與接收圖書。因日本人在佔領南京期間，將在南京的中央圖書館、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、中央研究院圖書館、中央大學與金陵大學圖書館、政府機關圖書館的圖書及一些私人藏書，全部集中在珠江路地質調查所大樓。我與儲連甲兄等每天到那邊會同其他機構派來的人員辦理清點，將各館圖書按收藏印章分開。柳翼謀教授為國學圖書館，繆鳳林教授為他自己的書，也每天在那裡，大家成了好朋友。特別是繆教授，因怕他的書為中央或國學兩館冒領，對我們這些從事清點的人，非常客氣，要我們替他注意。他讀過的書，不僅經過圈點，且有密密麻麻的記註。他是我的老師張其昀先生的同學，在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書，又因我也是學歷史的，所以對他的要求，答應為他留心。後來繆教授將他的書籍附在第三批運臺古物與圖書內，由他自己押運前來。大概因他與傅斯年先生之間，曾有不愉快的事，沒有住下來，即返大陸。他的書交給張其昀老師保管，也許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會知道這批書的下落。

清點結束，中央圖書館不僅取回原有的藏書，且得到陳羣澤存書庫的全部書籍，上海人文科學圖書館與上海自然科學圖書館的藏書，及日本在上海同文書院的所有日文書。這些書加上中央圖書館歷年在淪陷區內所搶購的善本書，藏書忽然增至一百萬冊。除利用頤和路澤存書庫原址，成立北城閱覽室外，並在成賢街館內空地修建一棟三層大樓，供閱覽與藏書之用。同時加緊編目，以便開放應用。想為這個緣故，我於1946年5月被提升為編輯，未幾又兼任中文編目股股長。中文編目股約有九人，就我能記憶的，有劉

國鈞先生哥哥劉純甫老先生，商衍鑾先生女公子商倩若小姐、俞靜之、紀維周、何其武、趙德權、胡德馨、童樂山等先生。我們同心合作，編好卡片，立刻手抄，每日進度約一百種。這一段生活，雖然非常緊張，但十分快樂。紀維周先生現仍在南京圖書館服務。工友王和林先生現在無錫鑽探工具廠工作。

編目組主任原為彭道真女士，後因她隨夫婿程希孟教授去美，改由呂紹虞先生代理。西文編目股，有舒紀維、張世昌、藍乾章諸先生及林愛芳女士。採訪組主任為于震寰先生，于先生赴美進修，何人代理已記不清楚，但有任蒞、朱寶珍兩女士在那裡工作。閱覽組主任為孫永齡先生，助理人員有儲連甲、邱克勤兩先生與朱學其女士。邱先生留在南京圖書館，文化大革命後曾任副館長，1989年病逝。特藏組設在澤存書庫內，由屈萬里先生擔任主任，有昌彼得與蘇瑩輝兩先生相助。總務組主任為繆鎮藩先生，除吳新澄先生主事務，陳步青先生主人事外，還有常希孟、凌鑫如、陶忠遠諸先生，與陳潔女士等。陳步青先生被派往廣州，在那裡設辦事處未果，後來轉往烏魯木齊，現在新疆大學教書。出版品國際交換處設在上海乍浦路471號，由顧華先生負責，孫家晉先生輔助。

初到南京，在中央圖書館膳廳吃飯，不僅有舒適的椅子，且有工友在旁幫忙添飯，使我受寵若驚。又收入有能力購買手錶、西服及想望已久的收音機。每晚在家除收聽美軍電台廣播外，且能聽英國廣播公司(BBC)的新聞廣播。1947年底我與樓占梅小姐結婚，婚後需要房屋，承繆鳳林先生將他在珠江路蓮花橋居安里21號園子內一棟空房租給我們住。後來成賢街長康里圖書館宿舍有空位，我們就搬到那裡。在南京的生活與重慶相比，可說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。

中國共產黨當日本侵略中國期間，在東北、綏遠、察哈爾、熱河、河北、山西、山東、安徽等各省，各掌握了一些地方政權。國共雙方雖經美國派馬歇爾將軍(General George C. Marshall)從中調解，始終未能取得共識，於是內戰發生。1948年初，中共攻下徐州，南京受到威脅。為求保護在南京的古物與圖書起見，教育部成立文物遷運小組，由教育部政務次長杭立武先生任組長，參加單位有故宮博物院、中央博物院、中央研究院、歷史語言研究所，及中央圖書館。議定將古物與圖書分四批送往臺灣，以策安全，每批每單位派押運人員二人，並准攜帶家眷。中央圖書館蔣復璁先生派我代表他參加小組開會。圖書館內



部的準備事宜，則由屈萬里先生負責。

第一批古物圖書與押運人員於 1948 年 12 月 20 日乘海軍中鼎號出發，領隊為李濟教授。各單位押運人員，故宮為莊尚嚴先生、中央博物院為譚旦問先生、歷史語言研究所為勞幹先生。中央圖書館原指定昌彼得與我，但臨上船時，只准一人先去，結果派了我。另外，還有外交部的檔案，押運員為余先生，我已忘其名。中鼎號到上海時，曾稍停留，至 26 日抵達基隆。航行期間，船身擺動甚烈，我不習慣坐船，嘔吐不停，幾乎全程臥著不能起來，也不能吃飯。莊尚嚴先生曾於 1936 年押運古物至倫敦展覽，他說，船經直布羅陀海峽(Strait of Gibraltar)時，風浪險惡，大部分旅客暈船，但他安全無事，使我們十分欽佩。我們到基隆時，恰是年尾，經過幾天，始將諸事安排妥當，將古物圖書自船中起出，以火車運至桃園楊梅，在那裡小住後，再運至臺中糖廠倉庫存放。

第二批古物圖書由招商局派海滬輪載運，於 1949 年 1 月 9 日運抵基隆。中央圖書館押運員有昌彼得、蘇瑩輝、任蒞三位。運送第三批古物圖書為海軍崑崙船，它於 1949 年 1 月 29 日離開南京，因中途停靠許多港口，至 2 月 22 日始到基隆。中央圖書館押運人員為顧華與儲連甲兩位先生。附船而來尚有員工十多人，內包括屈萬里、舒紀維、藍乾章等諸先生。因人數眾多，家眷另購船票，搭商船來臺。這二批古物圖書亦全部運至臺中糖廠倉庫。自屈萬里先生抵臺後，中央圖書館內部諸事，即由他處理。1948 年 8 月起，改由顧華先生負責。押運人員到臺中後，均先在一家旅館安置。後來得到臺中糖廠同意，在其靠振興路一邊空地建造宿舍 21 間。中央圖書館配到六間，分由顧華、昌彼得、蘇瑩輝、任蒞、儲連甲及我遷入居住。

蔣復璁館長於第一第二批圖書運抵臺灣後，自上海乘中興輪，於 1949 年 1 月 24 日至基隆。昌彼得兄與我相偕到基隆，將他接往臺北南昌街臺灣文化協進會居住。他於 28 日去臺中，然後轉往臺南、屏東等地，於 2 月 23 日飛廣州。在臺期間，他除視察中圖的圖書與會見押運人員外，並計劃在臺灣開館。他曾商得臺南市政府同意，借用文廟；臺南工學院借用員工宿舍。後來政府決定成立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，中央圖書館被併，他自己前往廣州後，即轉歐洲訪問考察，此事未曾實現。

在南京出發時，圖書館曾發給每一押運員生活費

，說明到臺灣後，可能有一段時間無薪金可領，並囑安心等待政府的安排。此事一直到 1949 年 10 月，在臺中成立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，由杭立武先生以教育部部長兼主任委員，中央圖書館組由顧華任組長後，情形始恢復正常。但在近十個月等待期間，除開箱放涼外，大家無事可做，再加上大陸軍事節節失利，不知未來如何，在心理上均感覺十分徬徨。部分人員為此陸續離去，如屈萬里先生受任臺灣大學副教授兼文書組組長，舒紀維先生接受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編目組職務，藍乾章先生參加臺灣大學圖書館工作，任蒞女士前往美國，儲連甲先生受聘為臺東圖書館閱覽組組長。我則應張其昀老師之邀上陽明山幫助他處理資料。1949 年 8 月革命實踐研究院正式成立，被聘為圖書課課長，負責圖書館事宜。我在南京臨危受命，押運宋元明善本圖書至安全地方，曾認為此係男兒為國應盡的義務。俟在臺一切就緒後，漸漸覺得中央圖書館特藏圖書，原由屈萬里、昌彼得、蘇瑩輝三位先生負責，在臺善本書，只要他們中有二人繼續看管就夠了。其他人員與這批書籍並無直接關係，被調前來，盡了押運的責任，沒有需要再留在臺中，有機會離臺中他就，實在是合情合理的事。這樣做，對保管是項圖書不僅毫無影響，且可減輕新成立的聯合管理處的負擔。

我在中央圖書館時期，適逢國家大變。我的工作地點，自西方的重慶，經過南京，搬到東邊的臺灣臺中。旅行幾萬里，見到無數各行各色人物，摩挲過不下十多萬冊的書本。雖然日日在緊張之中，但使我得到鍛鍊，增長見識。我在圖書館這行業裡一共做了 40 年，在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(Nar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)21 年，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 9 年，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圖書館 6 年，而以在中央圖書館的年份最短，但中央圖書館開了我從事圖書館事業的門。有了這四年多的訓練，使我以後在工作上，毫無阻礙，一帆風順。在離開四十多年後，追憶中央圖書館，人與事泰半已遺忘，但對中央圖書館，仍懷有十分親切的感情。

1993 年 1 月 15 日於堪培拉

• 王省吾先生，曾任本館編輯，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館長，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東方部主任，現已退休。



〈故 舊 篇〉

## 鄉嬛秘笈歷劫不磨

中央圖書館善本書集藏經緯談

昌彼得

民國 46 年 10 月，蔣故館長慰堂先生擴建南海路舊館館址的閱覽大廳落成，他親自撰了一付楹聯勝於大廳的兩柱，上聯有云：「珍存漢簡唐鈔宋刻明槧，皆鄉嬛秘笈，歷劫不磨」。中央圖書館(以下簡稱中圖)從南京運來臺灣的 12 萬冊善本圖書，在當年海內外圖書館善本收藏中，可以說是首屈一指。這批運臺的善本書，在 43 年 9 月中圖復館後，經過積極整理編輯善本書目出版，並開放閱覽，在圖書異常缺乏的當時，這批善本的公開，對於促進臺灣文史學術研究的風氣，以及出版事業的蓬勃興盛，起了很大的催化作用，其貢獻是不可泯沒的。

中央圖書館不像北平圖書館承襲京師圖書館，有明清內閣大庫的舊藏奠基，籌辦時可以說毫無基礎。然而不過十五年，竟有如此豐碩的收藏，假若不是因緣際會，是不可能臻此的。中圖籌備之初，僅由教育部撥發遜清學部舊藏的圖書四萬冊，其中有一部明初內府版「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」，此書也是內閣大庫之物，不知如何雜在學部藏書之中，中圖即以此書作為善本集藏的始基。繼奉令接收南京國學書局，除了清末金陵局刻書版外，有一部顧炎武的「肇域志」，是金陵書局付梓所清鈔的底本。隨後又陸續購到明嘉靖刻本「龍江船廠志」、太平天國官刊「英傑歸真」、清沈炳震「續唐詩話」稿本。在南京籌備時期，經費短絀，所能收藏的善本，僅此數部而已。

抗戰軍興，中圖隨政府疏散重慶，又購得吳縣許氏售出的善本數十種，收藏漸增。29 年 9 月結束籌備工作，國立中央圖書館正式成立，編制有特藏組專司善本書的典藏考編工作。這時，東南半壁俱已淪陷在日軍鐵蹄蹂躪之下。江南自來是我國人文的淵藪，民間收藏極富，那些文獻故家，因為生活艱困，迫不得已，紛紛拿出家藏出售，善本書流落市肆者甚多，美日等國的圖書館聞訊，多在設法籌款，冀圖收購。滬上有識之士，深懼這些民族文化財富，像歸安陸氏

碩宋樓藏書一樣，淪落異域，永劫難復，乃函電交加，向重慶中央政府進言，建議及時搶購。慰堂館長乃御命於 29 年 12 月潛赴香港，再轉上海，與葉恭綽、張壽鏞、何炳松等港滬文教人士密商蒐購的事宜。中圖在南京籌備時期，曾獲中英庚款董事會同意補助館廈建築經費 150 萬元，因覓取建地延誤，尚未及動工，而蘆溝橋事變發生。除了在 25 年用了 8 萬元，購買中央研究院在成賢街的舊房舍充作辦公處所，及在重慶花了 17 萬元建造了一座分館外，尚餘百餘萬元。復員建館既遙遙無期，而法幣有貶值的趨勢，因呈准以中英庚款會補助建築經費移作蒐購善本書之用。慰堂先生俟一切計議妥當後，於翌年一月下旬，離滬轉港返渝。他潛往上海，是冒著生命危險的，為了逃避日軍耳目，係用化名，但終被日軍特務偵知，緹騎追索，他已於先一日離滬。驚險的經過，慰堂先生曾撰寫「一剎那的決定」一文追憶，刊載於傳記文學三卷一期。

蒐購的工作，進行得相當順利，藏書之家深明大義，非常的合作，亦深知戰亂之時，難以世守，大都傾其所藏，售歸公家。不到一年，除普通舊籍外，所獲宋元明槧及稿鈔珍本，不下四、五萬冊，江南著名的藏書家如吳興張氏適園及其子張氏進圃、劉氏嘉業堂，金陵鄧氏羣碧樓，以及番禺沈氏的所藏，悉為中圖所有。其他如聊城楊氏海源閣、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等著名藏家零星散出的宋元精本，也購獲了不少。蒐購的工作，歷時兩年有餘，至 32 年始告結束，一共用了二百多萬元，除由中英庚款會補助建館經費支付外，不足之數，由政府增撥專款滙付。

30 年所購得之善本，均一一加蓋「中樞玄覽」印記，係取陸機文賦：「佇中樞以玄覽」，隱寓中央之意，倩上海金石名家王福庵篆刻，以資識別，陸續寄往香港，暫存放香港大學，擬空運重慶，曾包機空運了一次，但費用太過高昂，未再繼續。其餘的善本